

## 《四库提要》所见盛清学术偏见一例\*

朱鸿林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中国香港)

**摘要:**盛清乾嘉时代的考据学,以严谨客观著称于世,作者言必有征,因此也言而可信,结果便是新知新见的呈现。乾隆四十七年(1782)成书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正是这门学术的高度成就的表现。文章通过比较《四库提要》所载明朝中叶有名士大夫岳正(1418~1472)的两本著作的提要和这两篇提要所出的原书,发现这两书内容基本相同而提要则评价迥异其词。考据其故,发现这其实和提要撰写人以及《四库提要》一书的总纂官纪昀在学术上、政治上、感情上的亲好和认同情形有关。结论认为,《四库提要》内容素质参差,反映了官家编纂项目缺乏一致性的毛病,而撰写提要的馆臣,往往因其所持之特殊观点或立场,影响到对于一书的客观评价。读者同时需要明白提要原书作者的历史评价以及提要撰者的个人品格和好尚,才能不为其偏见所有。

**关键词:**《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考据学;岳正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6)04-0048-06

《四库全书》是18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图书编纂项目,其成品是帝制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手抄本丛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一书之完成和进呈,更是18世纪盛清时代学术成就最高点的具体反映。盛清学术以考据学成就最大,其超卓表现之一在于能使读者因对著作的可靠性有所掌握而获致新知新见。

《四库全书总目》的主要内容是10230篇批判性的“提要”。这些提要每篇都是四库馆内通称馆臣的精英士大夫学者在审阅一种著作之后所

作的。不管《四库全书》的品质有多少可议之处,“四库提要”这个副产品却自其面世之后,在判断以往的学术及文学成就上以及在促进相关知识的传播上,影响了很多世代的学者。我们今天将《四库全书》作一个整体来看时,它固然仍是一个巨大的帝王意志或一个耐人寻味的皇朝阴谋的有力证据,但卷帙繁富的《四库全书总目》也同样在为学者们提供着考据学问的宝贵资源<sup>①</sup>。迄今研究《四库全书》以及《总目》所载提要的成绩已经非常可观<sup>②</sup>,客观地也就反映了它们所具有的持

\* 收稿日期:2006-03-06

作者简介:朱鸿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

① 有关下文探论所及各点的背景,请参看 F. W. Mote,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Complete Printing of the *Ssu-k'u Chiu-an-shu*”,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Vol. 1, Number 2 (Spring 1987), pp. 26~50.

② 《四库全书》的相关研究文献极其丰富,此处不能尽举。除了本文所参考的以及上引 F. W. Mote 论文所引用的之外,读者可以参考:Chao-ying Fang[房兆楹]所撰纪昀传记后所引的书目, 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 C.: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43), p. 123;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七十六年史学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92~39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22~323页;“国立”中央图书馆编:《中国近二十年文史哲论文分类索引》,中央图书馆1970年版,第688~689页。按,1980年代以后的论著,多数已能透过文献数据库检索得知,故不尽列。

久学术价值。

但在研究《四库》书籍提要的大量文献中,却尚有提要质量并不整齐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未获足够注意。本文拟举一例,以见问题牵涉所及的学术意义。此例研究的是《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两本名称互异、篇幅不一、内容有显著相同之处,而作者姓名或见或不见的明人著作提要。众所周知,馆臣们审阅的书籍浩如烟海,其中有的经审阅后被编入“著录”之列,抄入《四库全书》之内;有的只具“存目”地位,被只列名于书目而不予抄入《全书》。本文研究的这两篇提要所属的著作,都是“存目”之书<sup>1</sup>。其中一本名为《类博杂言》,在《四库全书》分类中属于“子部杂家杂学”书籍,作者标明为岳正(1418~1472);另一本名为《蒙泉杂言》,属于“子部杂家杂说”书籍,不著撰人名氏<sup>1)</sup>(卷124,4页上;卷128,8页上)。

《类博杂言》的提要如下:

明岳正撰。正字季方,号蒙泉,潮县人。正统戊辰进士第一(按,此指会试第一),由编修改修撰。天顺中入阁预机事,以谋去石亨、曹吉祥不成,谪钦州同知。后逮系杖,戍肃州。宪宗立,复本官,留侍经筵。又以忤大学士李贤,出为兴化府知府。嘉靖初,追赠太常寺卿,谥文肃。臣等谨案,是书杂论阴阳五行及医卜星算之说,中间论大衍之数及皇极经世之数,亦颇有发明<sup>①</sup>。《明史艺文志》作二卷,今已编入正《类博稿》中;此本乃曹溶《学海类编》中所收,仅存六页,非其全也。(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蒙泉杂言》的提要如下:

不著撰人名氏。上卷采撮阴阳五行之说,率多穿凿附会。下卷随笔记载,如以书家永字八法为合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类,亦

多牵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类博杂言》和《蒙泉杂言》于明代均有单行刊本。《明史·艺文志》著录的《类博杂言》作2卷<sup>2)</sup>(卷98, P2433),但现存此二书的明刊本,其实均作1卷。《类博杂言》见于两个晚明刊刻的丛书之内:收入《百陵学山》的共有18条<sup>②</sup>,收入《学海类编》的少了1条<sup>③</sup>。《蒙泉杂言》见于明刊丛书《今献汇言》之内;共有46条。由于此二书的提要都没有谈及二书内容上的相同之处,我们可以断定二篇提要并非同一馆臣所撰。

问题的复杂性还因岳正文集《类博稿》卷3所载的“杂言”而增加。《类博稿》卷3标题作“杂言五十二首”;其实只有50条,分为“上”“下”两部分(上,1~25条)。《蒙泉杂言》、《类博杂言》、《类博稿》都出现的“杂言”,其文字也都一样。3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各所载录的条数和作者题名。明刊丛书《今献汇言》内的《蒙泉杂言》<sup>④</sup>,载录了见于《类博稿》卷3所载50条中的头47条(《蒙泉杂言》有一处合在《类博稿》中属于两条的为一条,故此算作46条)。但这个刻本上的首页第二行作者题名处,有十格却不明其故地上了墨钉,以至纸面上见不到岳正之名。《类博杂言》各条均见于《蒙泉杂言》所载的头24条之内。《百陵学山》和《学海类编》这两个丛书本的该书作者题名行,均明列“潮县蒙泉岳正季方”八字。《类博杂言》和《蒙泉杂言》同样也见于清初刊刻的丛书《说郭续》中<sup>⑤</sup>:前书只有38条,后书只有6条。据《类博杂言》提要所言,馆臣所处理的该书,便是载于《学海类编》内的(即只有17条)。《蒙泉杂言》提要注明“不著撰人名氏”,其情形与见于《今献汇言》本的相同。但提要说所据的该书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有“上卷”、“下卷”,则似乎别属一本,而现今未见流传。

① 有关这些哲学系统的现代论说,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Derk Bodde 英译本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Vol. 2, pp. 454-464.

② 《百陵学山》为高鸣凤(活跃于17世纪)所编,有万历(1573-1619)刻本,收入《元明善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及《百部丛刊集成》第6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年版)之中。

③ 《学海类编》为曹溶(1613-1685)所编,收入《百部丛刊集成》第24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67年版)之中;又有文源书局1964年版本。

④ 《今献汇言》为王文禄(活跃于1530-1560)所编,有隆庆(1567-1572)刻本,收入《元明善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及《百部丛刊集成》第8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67年版)之中。

⑤ 《说郭续》为陶珽所编,原本刊于顺治三年(1646),有(台北)新兴书局1964年版影印本。

博学的四库馆臣固然未尝察觉同在“子部杂家”之列的《类博杂言》和《蒙泉杂言》的相同身份,近代终身以辩证《四库提要》而增强其学术用处为志事的著名学者胡玉缙(1859~1940)和余嘉锡(1884~1955)<sup>①</sup>,也没有发现或加以处理。或许因为《类博杂言》和《蒙泉杂言》只属存目之书,胡、余二氏在考证《四库提要》时也没见过原书。但连《百部丛书集成》也不能为所收入的《蒙泉杂言》标明其作者为谁,却又不免令人讶异。该丛书的刊者印记明言,所选版本系经广泛比较现存版本后而决定的<sup>②</sup>。《蒙泉杂言》的作者,直到《中国丛书综录》才能有所澄清<sup>[3](第2册, P969)</sup>。可见,细心实干的书目学断然优于权宜的商业书刊所能提供的书目资料。

《类博稿》卷3的50条“杂言”的内容显示了,《四库全书总目》将《类博杂言》和《蒙泉杂言》归入“子部杂家类”是殊为恰当的<sup>③</sup>。这50条大致可以分成以下数类:第一类可有14条,谈的是宋儒性理学的宇宙观念和理论,尤其是有关周敦颐(1017~1073)和邵雍(1011~1077)的图书象数之学。第二类可有12条;是类似科学性质的论说,谈及自然现象、宇宙物体、动物植物等。第三类有6条,论及医卜星相之类的理论和习行。其余各条谈及文章体制、书法、儒佛之辨、历史人物、人类性情等等。大致上说,第二类和第三类时有洞见和中的之言;第一类论及岳正自己所据的邵雍宇宙论之言,不是勉强,便是玄虚;有关科学和自然现象、医药之论,所说更多附会。这是因为岳正以一个宋儒性理学的宇宙论架构而杂以理学家以及道家或道教的词汇来解释所有的自然和社会现象所致。这些“杂言”的道教色彩殊为明显。现代道教学者萧天石便曾在其所编的《道藏精

华》中,不加辨别地称之为“修身明道之宝”<sup>④</sup>。实际上,“杂言”中据自身经验立言的只有数条,其余都可算是书生之论。《蒙泉杂言》只比《类博稿》所载少了4条,不具比较意义。《类博杂言》所载的18条,依照以上的分类看,有14条可算属于第一类,4条可算属于第三类。

以上的内容认识,很容易便引起这样一个问题:何以两本内容一半相似的著作会在权威的《四库全书总目》中有两个评价截然不同的“提要”?这个评价上的矛盾,让我们意会到,《四库全书》提要的撰写和编辑过程,原来未必有良好的协调处理。提要原由不同的馆臣按照自己的工作配量分别撰写,馆臣们并不互相检视同仁所作,也没有如同小组讨论之事。《四库全书总目》的总其成者是著名的总纂官纪昀(1724~1805),但纪氏在评阅个别著作的提要时,未必一定核对该著作的原书,因而也不一定能够察觉即使是明显的差异或脱节。这种协调不良所产生的瑕疵,是官家纂修书籍的常见现象。但纪昀的过失总要大些,因为他同时也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

个别书籍的编纂过程也不见得严谨一致。这种情形我们可以从一个时称“飞签”的编目工具见到。北京图书馆藏本《诗意》一书,其卷端贴有飞签一纸,其上方有印记云:“总办处阅定,拟存目。”其下有长方印记云:“臣〔纪〕昀臣〔陆〕锡熊恭阅。”<sup>[4](P14)</sup>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事物纪原集类》一书上面<sup>⑤</sup>,亦贴有一张稍为破损的飞签,可以证明同样的编目方式,也应用在其他书籍上。因此可知,一书之是否著录抄进,至少名义上需由“总办处”在总纂官纪昀和(当时的)总校官陆锡熊准许之后才作决定。这个双重核对步骤,可以肯定每种著作在编纂过程中都获

① 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1965年版)。

② 《今献汇言》为王文禄(活跃于1530~1560)所编,有隆庆(1567~1572)刻本,收入《元明善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及《百部丛刊集成》第8集(台北:艺术印书馆1967年版)之中。

③ 有关“笔记小说”作为中国文体的一种讨论,参看 Frederick W. Mote, “The Ch’o Keng Lu: A Fourteenth-century Miscellany”,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Vol. 48, Number 3 (Spring 1987)。

④ 萧天石编《道藏精华》第14集第5期(台北:自由出版社1976年版)。此期所载为影印明刊本《学山证道秘书》本所载之《蒙泉杂言》。按,《学山证道秘书》为明刊丛书《百陵学山》之选本,原委见此期之萧天石序。

⑤ 屈万里:《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目》,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第316~317页。该飞签之图片,见前引 F. W. Mote 论文中。

得认真的处理。但是,本文的例子却显示了,这些主要负责官员并不必然阅读每本经由他们批准而著录(或不著录)的书籍。飞签上面刊印的“恭阅”二字,看来指的是对一书的“提要”的阅定多于对一书本身的阅定。这样,代表两名最高负责官员承认个人责任的印记,看来也只是相当的例行公事而已。

考据学盛行时代的有名学者,其学术训练看来也是人各不同的。撰写《类博杂言》提要的馆臣,无疑曾经认真阅读该书,并曾就《明史·艺文志》作应有的书目检查。从谈及《学海类编》所载的此书并非完书而见于《类博稿》的才是之处,还可见其曾就《类博稿》进行过核对工作。相反,《蒙泉杂言》提要的撰者便显得考据疏略而知识有限。他既未曾阅读过岳正的文集,也未曾看过收入《类博杂言》的丛书《百陵学山》。他也不熟《明史》,否则不会错过《蒙泉杂言》本身所提供关于作者的线索。此书其中一条(第25条)有“岳子”二字,另一条(第45条)有“比成酒泉”一句,又一条(第46条)有“予戊甘〔肃〕时”一句<sup>①</sup>,都是线索。《明史》读者自然不难知道,这个曾经戍于酒泉、甘肃的“岳子”之为岳正。《蒙泉杂言》提要作者的表现,正像现代研究《四库全书》的专家郭伯恭批评纪昀时所说的:“疏忽与武断耳。”<sup>[5](P223)</sup>

个人学术素养不同之外,不同的学术背景也是《类博杂言》和《蒙泉杂言》这二书的提要所以评鹭大异其词之故。《四库全书》馆臣大致上可以归类为时人所称的“汉学”与“宋学”两派人物。“汉学家”决然强调实事求是的考据之说,“宋学家”某种程度上较为强调抽象哲理。两家的馆臣虽为同仁,但彼此的治学态度与学问表现并不一致。纪昀撰《四库全书》目录,“颇诋宋儒”,倾向宋学的姚鼐(1732~1815)便曾“直斥其妄”<sup>[6](P31)</sup>。

《类博杂言》提要的撰者看来不是专与“老

旧”的宋儒为难的典型汉学家。照他对此书论说之称许处看,要不是岳正的《类博稿》已经著录的话,此书必将被“拟”著录。但据本文的分析所示,《类博杂言》的内容,实多牵强空疏,甚至穿凿附会之论。可见,此书的提要撰者存在偏见。相反,内容比较丰富的《蒙泉杂言》,虽多客观和洞见之论,但其提要却有此书“率多穿凿附会”和牵强之论的负面批评。这篇提要的撰者明显是个不以宋儒的宇宙理论为然的考据学家;正是他的偏见,使他不能对此书及其作者作出细心的考究。

我们无法判定这样的学问行为有多少是故意的,也无法避免这样的一个疑题:为何宋学家能够如汉学家一般的应用考据学,而汉学家反而不从自己的家法据实考证。这其中的理由便是,当时的学术论断并非全数据理而发,而是经常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偏见。考据并非考据学家的专利,而考据学家却让他们的学术偏见影响了自己的学问。我们因此需要注意,宋学家会倾向隐藏宋儒或宋明儒学的瑕疵,汉学家则会对宋明理学过分苛评和武断;二家所言,我们无疑都不能轻信。

学术偏见的起因还不止于学问认知上的差异。就《类博杂言》和《蒙泉杂言》这两篇提要的情况而言,还有一个文以人重的原因在。问题实与岳正此人的历史评价有关<sup>②</sup>。岳正是15世纪中期一个传奇性的高级文官,曾经仕途看好而终以悲剧收场。他是顺天府的灤县人,正统十三年(1448)会试第一,殿试第三,授翰林院编修。天顺元年(1457)正月,明英宗复辟;六月,岳正以修撰被命入内阁办事(等于一名准内阁大学士)。但在短短的28天之后,便突然被夺职贬为钦州同知,未及上任,又被“逮系诏狱,杖百,戍肃州”。后来获释回家为民。过了7年,在明宪宗继位之后,岳正因御史进言,获得恢复名誉,并以翰林修撰的原来官职充当经筵官,但却没有让他再入内阁办事。最终他又被任命为福建兴化知府这样一个省级官员;就任数年之后,他也自行请求致仕

① 《蒙泉杂言》(《今献汇言》本)页8上、11上、11页下。

② 岳正史传,见《明史》卷176,第4679页。叶盛(1420~1474)所撰岳正墓志铭以及李东阳(1447~1516)所撰“补传”,隆庆元年(1567)本《类博稿》载于卷首,《四库全书》本《类博稿》载于“附录”。关于岳正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讨论,参看 Hung-lam Chu, "Ch'iu Chun (1421~1495) and the Ta-hsueh yen-i pu: Statecraft Thought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pp. 365~369.

而去。

岳正其实是在一场冒险而噪进的政治斗争中创伤了自己而垮台的。明英宗凭“夺门之变”重登帝位，“夺门之变”的预谋者和执行人是高级宦官曹吉祥和高级将领石亨。曹、石二人自恃功劳，自天顺改元之后，便权倾朝廷，制肘英宗。岳正在获得英宗的允许之下，企图以机谋让曹、石这两名时已分别贵为宦官之首和武臣之首的政治强人互相倾轧，却因事机不密而反为曹、石所害。岳正一向敢言和自负，复职之后与当时的主流官场作风殊不协调，所以才被外调。《明史》称他“勇事敢言”而“自信不回”，又说他“意广才疏，欲以纵横之术离散权党，反为所噬，人皆迂而惜之”，但他总不失为一名气节之士。史传称他“博学能文章”，15世纪的艺术圈也承认他是出色的书法家以及绘写葡萄的大画家。其文集《类博稿》在他身后的成化二十二年（1486）刊行于浙江金华，此后又在湖广襄阳以及福建莆田二处重刻。此集由岳正的快婿、著名的文学家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6）作序<sup>①</sup>。

明人和《明史》对于岳正均有正面的评价，这对于明知作者的《类博杂言》的提要撰者是不会无所影响的。被著录的《类博稿》的提要看来也同样受着有德者必有言的思想的影响。《类博稿》的提要如下：

明岳正撰。正有《类博杂言》，已著录。天顺复辟以后，夺门诸臣挟功骄恣，帝心畏之，而不敢遽图。正以书生支撑其间，欲设计以离曹吉祥、石亨之交，事不能成，反为所中，至于窜谪濒死，其策虽疏，其志要为忠荃。及群奸继败，又厄于李贤（1408～1466）之媚嫉，沦落以终，姜桂之性，始终不改。嘉靖初，追赠太常寺卿。制词有云：“嫉邪已甚，受谤寔深。左谪南荒，再编西戍。既而逆臣伏轂，正士赐环，拟陟卿曹，庶金言之久协；出分符守，竟直道之难容。”纪其实也。

其文章亦天真烂漫，落落自将。史称所草承天门灾谕廷臣诏，剀切感人，举朝传诵，

足以见其一斑矣。是集为其门人李东阳搜辑遗稿而成，凡诗二卷，杂文八卷，又附录二卷；前一卷载诸人志铭传赞等作，后一卷则东阳以叶盛所作志铭多所隐讳，为正补传也。

传称正晚好《皇极书》，故所作《杂言》二篇，皆阐邵子之学，而诗亦纯为邵子《击壤集》体。东阳《怀麓堂诗话》称：“蒙翁才甚高，俯视一世，独不屑为诗，云‘既要平仄，又要对偶，安得许多工夫’云云。”盖得其实。而传乃称以雅健脱俗，未免阿其所好。至称其文高简峻拔，追古作者，则不失为公评。正统、成化以后，台阁之体渐成啾缓之音，惟正文风格峭劲，如其为人。东阳受学于正，又娶正女，其《怀麓堂集》亦称一代词宗，然雍容有余，气骨终不逮正也，所谓言者心之声欤。<sup>[1]（卷170，9页下）</sup>

这篇详尽的提要对于岳正的政治遭遇充满同情，对于岳正的性格志节也表示爱惜，而因称重其人，对于岳正的诗文造诣也增加了爱重之意，不止同意李东阳所作的评论，且更认为其格调实在高出李氏之上。这样的爱慕和称许，同样也是导致《类博杂言》获得不加鉴别的肯定的原因。相反，《蒙泉杂言》提要的撰者，却在不知作者为谁的情况下，能够就书言书，无所假借，尽管其之所言也同样未尽公允。

《类博杂言》获得优评的提要，最终还有一个地域认同的原因在。地域认同往往使人对其同乡先贤多说好话。我们虽然不知道谁为《类博稿》和《类博杂言》二书撰写提要，但这两篇提要的定本与纪昀这个岳正的异代顺天府同乡不能无关<sup>②</sup>。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对于《四库全书总目》所载的提要，实有修订润饰之功，因而从中也表现了他的个人之见<sup>[5]（P213）</sup>。岳正卒后被祀为顺天府乡贤，实际上也是明代顺天地方仅有的几个名宦之一。纪昀可能出于乡情而不自觉地在订定甚或改写《类博稿》提要时，对岳正的人物和文章作了更多的称许和更少的批判。按照《四库全书》的编纂凡例，《类博杂言》只是“存目”之

① 有关岳正遗著的编刊，见隆庆元年本《类博稿》卷首李东阳成化二十二年（1486）撰序及吴廷嘉靖十八年（1539）撰序。

②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p. 120 - 123, Chi Yun [纪昀] 传。

书。存目之书本是“其书虽关系世道人心，有裨实用，而其中有俚浅讹谬之言”<sup>[6](P50)</sup>，但“著录”了的《类博稿》，其提要却对岳正这些“杂言”称赞有加。这样的情形便只有纪昀之加强主观评断才能解释。

《四库全书》提要之有如上所见的瑕疵，原因并不难寻。每篇提要代表的是在编纂过程中经过处理的独立一书，而全部提要有 10230 条之多。《四库全书》之成编，诚如余嘉锡所言，是“成于众手，迫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的产品<sup>[7](P388)</sup>。编纂者需要耗费的时间，多在一书之文本订正和校对上面，少有优游时间讨论一书之论旨和要义。再加上参考资料之或缺或不足，提要撰者往往“自不免因陋就简，仓猝成篇”<sup>[7](P389)</sup>。更坏的情形便是，未见之书甚多，“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sup>[7](P389)</sup>。馆臣在处理明人著作时，这种情形便更经常出现，而且褒贬更形武断，倾向性地贬低其学术价值。

官家纂修书籍本来便较少是客观而深入研究的成品。纪昀以其渊博学问和典雅文章，事实上已经将《四库全书总目》中很多提要的质量提高了不少，使之“考据益臻详贍，文体亦复畅达”<sup>[7](P590)</sup>。但《四库全书》著录书籍超过 1 万种，总卷数超过 17 万卷，要纪昀个人在审阅每篇提要时都能复核原书，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毫无疑问，纪昀没有以自己的研究来印证每篇提要所言。他的做法，只能如余嘉锡所说的：“恃其博洽，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有并不如原作之矜慎者。”<sup>[7](P590)</sup> 这样有损自己学问的学术自大，也是为官方支持下自号大家者的普遍表现。纪昀在为《四库全书总目》作出整齐体式和平衡内容上的成就，至多也只能指那些《四库全书》著录的著作的提要而言。

以上所说，固然不是否认盛清目录学的成就和力量，更非表示《四库全书总目》不再值得参考。至少我们应该承认，整体而言，馆臣的学术是高水平的。他们所采用的分类标准也很值得注意。本文所讨论的两本著作虽然同在“子部杂家”分类之中，但它们在次分类中仍有不同。如前指出的，《类博杂言》属于“杂学”而《蒙泉杂言》属于“杂说”。按照馆臣的定义，“杂学”是“出入

九流，旁及释典，宗旨杂错，不拘何家。……依托儒家，说理而有出入，论事而参利害，不纯为儒家言者”<sup>[6](P147)</sup>。严格地说，《类博杂言》所载的 18 条，其性质正是这样。“杂说”则是“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不分次第，兴之所至，即可成篇”的<sup>[6](P147)</sup>。据此，《蒙泉杂言》的 46 条，除了也见于《类博杂言》的 18 条之外，其性质也正如此义。这样，我们便清楚可见，提要撰者虽然在学术取向上有所不同，他们对于这两本著作的分类，还是各有所据，是在通览全书而后作的。在这点上，他们至少坚持了一些共同的目录学原则，而这点对于我们而言是有用的。《四库全书》存目之书，超过 6800 种。我们利用《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作为指引，阅读各书提要，便能有信心认识到一本书的大概内容和此书的性质。

本文的讨论显示，18 世纪的考据学并非完美无缺之学。负责编纂《四库全书》的馆臣们都各自有其学术上、政治上、感情上的亲好和认同，而在学问工作上也各有不同的训练。《四库全书》各书的提要情形，反映了官家编纂项目缺乏一致性的毛病。考据学的力量，在于言者之所言有据可证而足以取信。但馆臣在诸书提要中所提的证据，却非全免于错误而能使其所言公正可信。他们往往因为一些特殊的观点，影响到他们对于一书之评价。要掌握这些观点，便需要同时明白提要原书作者的历史评价以及提要撰者的个人品格和偏见。多些反映这类偏见的知识，才能让 18 世纪的学术思想史获得一个更为周延的概论。

#### 【参考文献】

- [1] 永瑢，纪昀，等纂.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 上海：大东书局，1926.
- [2] 张廷玉，等撰.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 中国丛书综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4] 王重民. 中国善本书提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5] 郭伯恭. 四库全书纂修考[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6] 任松如. 四库全书答问[M]. 上海：启智书局，1934.
- [7] 余嘉锡. 余嘉锡论学杂著[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责任编辑：赵洪艳】